

鄂·东·历·史·文·化·名·人·研·究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

——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李桂生 郭伟方向红◎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鄂·东·历·史·文·化·名·人·研·究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

——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李桂生 郭伟 方向红◎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 李桂生, 郭伟, 方向红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210 - 05803 - 8

I. ①多… II. ①李… ②郭… ③方… III. ①李贽(1527 ~ 1602) - 军事思想 - 研究 IV. ①E092.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2773 号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作 者:李桂生, 郭伟, 方向红著

责任编辑:陈子欣

封面设计:关科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 jxpph. com

E - mail: jxpph@ tom. com web@ jxpph. com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683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815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7. 25

字数:18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5803 - 8

赣版权登字—01—2013—159

定价:18. 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李贽是我向来很崇敬的思想家之一。早在 2002 年 9 月考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时,我就想做李贽研究,只是李贽研究比较广泛,也比较深入,成果很多,要有点自己的见解实属不易,故弃难就易,选择了相对薄弱的先秦兵家研究。

我曾在军事院校从事参谋工作多年,因为工作繁杂,所以根本无暇潜心于学术。本以为已放弃了的研究课题,往后恐再难拾起,可是世事往往出乎人的意料。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于 2006 年 3 月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就是这转业让我与李贽研究又续上了关系。

转业后,我受聘于黄冈师范学院。黄冈师范学院地处黄州,黄州不仅是苏轼谪居之地,而且与李贽隐居讲学之黄安(今湖北红安)、麻城不远,三地均属黄冈市管辖。加之,我的家乡江西宁都,地处武夷山脉西麓,与福建交界,和李贽故乡泉州相距不远。这样看来,冥冥之中似乎真有那么一点机缘巧合。

李贽是一位奇特的思想战士,他一生都在奔走、呐喊、战斗、思考和写作,从未向已现没落端倪的帝王专制制度低头,最终自刎于狱中。虽然他的人生结局是一个悲剧,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可是李贽自己却认为死得其所,死得畅快,死得名满天下。这是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而这正是李贽之所以为李贽的原因。

2008年,黄冈师范学院鄂东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获批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该中心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鄂东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鄂东包括今日之咸宁、黄冈、鄂州、黄石四个地区,在学术上自成一体,而黄冈恰为鄂东之文化学术中心。黄冈人杰地灵,自古以来文教昌明,英才辈出,涌现了大批文化、经济、科技、宗教、政治、军事等名人。譬如,黄冈籍名人有毕昇、道信、弘忍、耿定向、耿定理、潘大临、刘子壮、顾景星、吴国伦、陈诗、帅承瀛、瞿九思、汪可受、李时珍、庞安时、万密斋、杨济泰、王葆心、黄侃、闻一多、汤用彤、废名、叶君健、胡风、熊十力、徐复观、殷海光、李四光、王亚南、董必武、李先念、林彪、王树声、韩先楚、陈再道、陈锡联等。客籍黄冈的名人有慧能、程颢、程颐、杜牧、王禹偁、张耒、苏轼、岳飞等。“鄂东名人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从上古到民国几千年间的鄂东籍和客籍鄂东的历史文化名人,以文化为背景,以文献为基础,以思想为核心,以学术为标杆,探讨鄂东历史名人的学术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鄂东名人辈出的原因、机制与规律;从文化发生与文化生态角度建立并定义“鄂东学派”与“鄂东文化圈”的概念;把鄂东文化学术放置于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与其他地域文化学术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年,研究中心有10项课题被列为规划项目,我所负责的“李贽军事思想研究”就是其中一项。

李贽的军事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只占很小的部分,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军事思想主要见于《孙子参同》、《兵食论》及《战国论》,亦散见于其史论、政论及书信之中。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只能检索到两篇论文:一篇是李贽研究名家张建业教授的《从〈孙子参同〉看李贽的军事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一篇是刘平、高峰的《略论李贽的〈孙子参同〉》(《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这与李贽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及

其兵学研究成就很不相称。系统梳理李贽的军事思想,从明朝中晚期社会视野来观照李贽,把李贽的军事思想放置在明朝中晚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并把李贽军事思想放置在诸子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多元视阈之中考察,并与其相关思想进行映照,便能很好地理解李贽“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的感叹,以及儒、佛、道多元交织的李贽军事思想。这正是本课题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

万历八年(1580),李贽姚安知府任满,便辞官赴黄安(今湖北红安)投奔耿定向、耿定理兄弟,潜心读书和著述。万历十三年(1585)迁居麻城维摩庵,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被逐出麻城,避难黄檗山,在鄂东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其中在麻城居住的时间有十五年。李贽的大多数著作完成于湖北麻城,《孙子参同》也不例外。《孙子参同》初名《读孙武子十三篇》,基本完成于湖北麻城,最后修订和更名于山西大同。可以说,是湖北麻城成就了李贽。

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小册子,正是我所负责的“李贽军事思想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课题组由我和郭伟、方向红组成。全书由我拟定写作提纲,确立写作思路,提出主要观点,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郭伟负责第二、四、六章大部分内容的撰写,方向红负责第一、三、五章大部分内容的撰写。其中第一章第一节“李贽所处的环境”之第四小节“思想环境”、第五小节“鄂东文化环境”,第二章第二节“李贽编纂《孙子参同》的时地”,第五章第四节“李贽的社会思想”,第六章第一节“李贽军事思想的时代特征”和第七章附论《李贽评价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原因探析》由我撰写。而《李贽评价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原因探析》是2012年6月9日我参加由中国明史学会、荆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虽然与“李贽军事思想”不很吻合,但其中谈到了李贽与张居正具有相近的兵学思想,也算是对李贽研究的一个补充,所以把这篇文章

附录于后。全书最后由我统稿,从语言的锤炼到材料的补充,从引文的核对到结构的调整,进行了五次全面的修改和润色。

李贽虽然晚年客居湖北红安、麻城,但是李贽之思想早已融于鄂东的文化之中,为鄂东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说,湖北麻城成就了李贽,李贽亦丰富了湖北麻城。

李桂生

2012年8月于黄州菊斋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李贽所处的环境及其生平与著述 / 1

- 一、李贽所处的环境 / 1
 - 二、李贽生平与著述 / 19
-

第二章 李贽编纂《孙子参同》的时地和动机 / 32

- 一、李贽编纂《孙子参同》的时地 / 33
 - 二、李贽编纂《孙子参同》的动机 / 41
-

第三章 李贽军事思想的多元文化要素 / 60

- 一、李贽军事思想的儒家文化要素 / 61
- 二、李贽军事思想的佛家文化要素 / 79
- 三、李贽军事思想的道家文化要素 / 91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第四章 《孙子参同》体例与李贽军事思想体系 / 97

- 一、《孙子参同》体例 / 99
- 二、李贽军事思想体系 / 101
- 三、李贽军事思想的辩证思维 / 135

第五章 与李贽军事思想相关的思想 / 143

- 一、李贽的哲学思想 / 143
- 二、李贽的政治思想 / 149
- 三、李贽的历史思想 / 161
- 四、李贽的社会思想 / 168

第六章 李贽军事思想的时代特征与社会影响 / 184

- 一、李贽军事思想的时代特征 / 184
- 二、李贽军事思想的社会影响 / 190

第七章 附论:李贽评价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原因探析 / 195

主要参考书目 / 216

后 记 / 219

第一章



李贽所处的环境及其生平与著述

李贽是生活于明朝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思想家,其生前和身后均以狂怪闻名。其晚期主要生活在鄂东的黄麻(黄安、麻城)之地,留下了丰富的著述,但一直遭到统治者的禁毁,然而其书愈禁愈畅销,其思想广泛流布于社会,令后学如狂,其思想或隐或显地照耀着那些有着激进思想的文人士大夫。中国文化是由儒、道、墨、法、名、兵等诸子百家思想组成的多元结构。李贽深广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多元结构的典型代表之一。就其思想主体而言,是儒、释、道、兵兼容。就其领域而言,则涉及哲学、史学、美学、文学、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在李贽的思想中,亦包含军事方面的内容,而人们对李贽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史学、文学和政治等方面,对军事方面却多有忽略。李贽的军事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文人论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李贽所处的环境

一个人的经历以及在经历中形成的个性,对其一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李贽的狂怪与他生活的时代密不可分。他的思考和批判都有一定的历史境遇性。李贽所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明朝已经由盛转衰,处于大厦将倾、国势衰颓之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时。政治上,随着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没落,各级官僚和地主对广大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也越来越严酷,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中等规模的暴动不断发生。同时,民族矛盾逐渐显露,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不断扰乱边境。沿海地区,倭寇与海盗趁火打劫,人民生活不得安宁。经济上,明代经济缓慢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意识形态上,统治者用来束缚民众的程朱理学已无力统摄人心,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却激荡着士人的心灵,市民阶层也开始觉醒,思想上的抗争逐渐兴起。

(一) 政治环境

明朝中后期君主专制统治极其腐朽和黑暗。明朝建立不久,明太祖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帝王专制的中央集权,皇权高涨到极点。明朝法律异常残酷,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统治者日趋腐败,滥用刑律,随意罗织罪名,迫害无辜百姓。为了巩固皇权,遍设特务机构,强化专制统治,对各级官吏的异端思想和行为加以抑制和防范。

在李贽生活的时代,明世宗、明神宗都曾十几、二十年不理朝政,皇帝的昏庸无能、贪图享乐导致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专权是明朝中期以后朝政最腐败的突出表现。英宗年幼继位,宦官王振掌司礼监,操纵小皇帝,勾结大臣,排除异己,公然把明太祖在开国初期为防宦官专政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移至宫外,一时权倾朝野。武宗正德时,宦官刘瑾总管东厂、西厂,权势煊赫一时,满朝公卿,皆出其门。明朝中期,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宦官把持朝政,飞扬跋扈,贪污成风,特务横行,政治更加腐败黑暗。人们视宦官为虎狼,见之即躲避,全国处于一片恐怖之中。除宦官当政外,又有内阁首辅之争。内阁建立于明成祖时,规定大学士参与机务,但只是皇帝的顾问。明世宗在位时,鉴于武宗时宦官专权,便增加内阁的人数,提升内阁的地位,遂有“首辅”、“次辅”和“群辅”之别。其中只有“首辅”才有票拟权,权力远在其他阁臣之上。在嘉靖近半个世纪中,首辅成为统

治阶级内部争夺的核心职位。嘉靖时,严嵩任首辅十余年,朝臣三十余人自愿当他的干儿子,朝廷上下贪污受贿成风。神宗万历八年(1580),首辅张居正卧病,自六部大臣至各省外官,趋炎附势,日夜看觑,为其设斋醮、求长生。阉党横行,内阁争权,皇帝淫奢,致使整个王朝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李贽出生在泉州,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和壮年,均在泉州度过。当时泉州和其他地方一样,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地主对农民的盘剥和压榨非常残酷。从嘉靖元年(1522)到嘉靖四十年(1561),也就是李贽出生前五年到他离开泉州后五年的40年内,泉州地区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譬如,嘉靖元年至三年,汀漳农民起义军屡次攻泉州,败官军,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李贽同情农民起义,认为贪官污吏是公开而合法的大盗,这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

(二) 经济环境

16世纪前后的中国,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水平已超越前代。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技术的迅速提高,使商品经济活跃起来,新城镇不断涌现,在农耕经济内逐渐孕育出新的经济因素,在沿海许多城镇的许多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苏州一处纺织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机房机工有几千,染坊染工又有几千。当时国内著名的东南丝织机户,以吴、越、闽为著,其原材料多取自浙江湖州的蚕茧。西北的丝织机户,山西潞州最著名,其原材料取自四川阆州的蚕茧。其他手工业,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安徽的茶叶等,都行销海内外。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当时土地占有愈来愈集中,皇族、太监、官僚、士绅、土豪大量圈占土地,出现“皇庄”、“藩王庄园”等。穆宗隆庆三年(1569),应天巡抚海瑞反对豪强贵族侵占良田,结果被革职。当时大学士徐阶就有良田24万亩,海瑞曾以大义劝徐阶退还一些田地给百姓。神宗时,江南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大地主占田7万顷。^①明代皇族、官僚及地主等强夺农民土地,进行多方面的残酷剥削,许多农民陷于破产的境地,生活无法维持,致使大批农民流亡,从而成为庄园的奴隶,或成为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或成为无业流民。残酷的经济剥削,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的状态。

李贽的生长地泉州,自宋元以来就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成为与海外交通、贸易的要冲,泉州府是当时中国海外商业贸易最发达的地区。外国商人在此经商、定居者甚多,当时的泉州城南专门划出一块“特区”供远道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居住,谓之“番坊”。异域番邦多种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亦在泉州交融并存。明初,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明朝统治者严禁濒海居民出海,并明文规定“诸番敢有私下互市者,必施以重法”。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从而在明王朝内部产生了“严海禁”与“弛海禁”的争论。尽管明朝一禁再禁,但海禁基本上松弛下来,海外贸易不断扩大。泉州商业的繁荣,在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给人们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著名学者葛兆光说:“种种迹象表明,在嘉靖以后,民间社会渐渐拥有较大的空间,市民生活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伦理同一性的约束越来越小,而官方控制力也越来越松弛。”^②此外,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也开始萌动,她们开始淡漠贞洁观念,追求时尚,注重才情,这显然为李贽形成个性自由及男女平等的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基础。

(三) 军事环境

整个明朝,战争不断,军事形势严峻。明太祖朱元璋是“马上取天下”的开国皇帝,特别重视对军队的控制。洪武初年,设大都督府,总揽全国兵权,后废除大都督府,分设左、右、中、前、

^①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后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约,共掌军权。遇有战事,兵部奉旨调兵,由皇帝临时任命将领统兵作战。战事结束,将领归还将印,士兵各回卫所。将不专军,军无私将,军队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兵权的集中,严重束缚了将士才干的发挥。明朝中期,正德皇帝崇尚武功,但他的肆意妄为以及对军事的嬉戏态度,严重干扰了军政建设。武宗皇帝朱厚照起先在豹房搏虎,后又在宫中练兵。正德十二年(1517),蒙古小王子率5万骑兵入侵,武宗不顾群臣反对,御驾亲征,最后以损伤兵将600余人斩杀对方16人的代价班师回朝。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借口皇帝荒淫无道,起兵造反。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擒获宁王,但武宗放了宁王,自己带兵再把宁王抓获。这位胡闹、任性的皇帝,开始自称总兵官,继而自称威武大将军。武宗的军事冒险,给朝廷带来混乱,有奏折直指武宗朱厚照“临御以来,祖宗之纪纲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复坏于边帅之手,盖荡然无余”。

明朝边境,几个少数民族军事力量并立,而明朝兵权集中于皇帝,皇帝的无能及官僚的贪腐使边境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自元朝灭亡后,退居塞北的蒙古贵族仍控制蒙古草原故地,贵族内部为争夺地盘,冲突迭起,械斗不断。同时,又经常侵入长城以内劫掠,破坏明朝北方边境的农业生产。明朝廷一方面在长城以北设立卫所,派重兵驻守,打击蒙古贵族南下骚扰;另一方面又采取遣使通好及赐官封爵的怀柔政策予以安抚。明朝初期,成祖五次亲征,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割据势力,把蒙古各部置于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但在明英宗正统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曾经衰败的瓦剌势力再度崛起,不断侵扰明朝北部边境。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部以也先为首领大举南侵,太监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结果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当时北京防务空虚,所余士卒不满十万,兵部侍郎于谦力主抗战,率兵打败瓦剌,取得北京保卫战的重大胜利。英宗复位后,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捕杀以于谦为代表的主战派,明代的军政从此一蹶不振。瓦剌部败退后,鞑靼部又乘机而起,势力不断扩大,经常南下抢掠。嘉靖时,严嵩专权,军政更加颓弱。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部俺答军直逼北京,在北京城外大肆掠夺,满载而归。此后二十余年,鞑靼长期引兵南下,明朝官军无力剿灭,只是为防遭受袭击,在边关设重兵把守,并修缮长城。万历年间,东北边境的女真贵族野心越来越大,不断挑起事端,严重威胁了明朝在东北的统治。

沿海地区,日本战败的贵族搜罗残兵败将、武士浪人和走私商贩,组成海盗集团,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骚扰,史称“倭寇”。明初军力强盛,在沿海置卫筑城,积极防守,倭寇不敢入侵内地,但在明代中期以后,政治极度腐败,海防逐渐废弛,倭寇气焰日益嚣张,侵扰内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富豪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中的一些人盘踞海岛,勾结倭寇,组织武装,进行抢掠。此时的明政府,国力军力衰弱,无力清除这些势力,倭寇更为肆虐。嘉靖二十七年(1548),倭寇伙同葡萄牙军队,入侵浙江定海和福建漳州。浙江巡抚朱纨积极抗倭,打退倭寇,并严惩通倭奸商,但这一举措触犯了官僚与豪商的利益。不久,朱纨被革职下狱,自杀而亡。从此,明朝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愈发猖狂。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拥战舰百艘,大规模骚扰江浙沿海,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沿途烧杀淫掠,繁华市镇遭受兵燹,顿时化为断壁颓垣。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抗击倭寇,取得重大胜利,但遭到首辅严嵩的诬陷,被处死。从此,倭寇之患日甚。

李贽的家乡泉州,屡遭倭寇侵袭,而统治者面对倭寇入侵,束手无策。李贽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制,正赶上倭寇肆虐。李贽记述云:“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

士间关夜行昼伏，余六月方抵家。”^①李贽身着孝服，无暇守孝，“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余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②由于倭寇的连年侵扰，泉州一带数年田亩遍为草莽，瘟疫流行，死者枕藉。李贽的家乡泉州虽饱受倭寇侵袭之苦，但泉州百姓家自为战，人自为兵，纷纷自发登城护卫。民众奋不顾身的义行令李贽感到兵与食乃人类生存的两大基本需求，兵实乃因需而生，因需而用，“不赏而自劝，不谋而同趋”，自然而然，无须圣人教化，无须“孝悌之申”，而官方之教，如画蛇添足。李贽有感于此而创《兵食论》，驳斥了儒家“信重于兵食”的观点。李贽之兵说，糅入老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兵家之论中独具一格。这种思想在注解《孙子兵法》中得到充分发挥，是构成李贽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思想环境

明朝初期由于刚从战乱中恢复过来，百废待兴，人们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刘基、宋濂是从元朝过渡而来的学者，他们均秉承宋元理学的精神，无疑属于理学家的范畴。“读书种子”方孝孺被明成祖朱棣杀了。此外有曹端、解缙等醇儒，虽有一些著述，但是缺乏理论建树。可知明初的思想学术比较凋零。明朝仁宣时期，出现了所谓的“仁宣之治”。薛瑄在学术上秉承程朱理学，并躬行实践，著述讲学，从者甚众，影响很大，被称为“河东学派”。薛瑄的后学弟子很多，中有吕柟者，人称“泾野先生”，在当时最为有名。他们承袭薛瑄的学说，又加以改造发挥，形成“关中之学”，强调理气不隔断，性气不相离。明史学家商传云：“吕柟更在其基础上改变了薛瑄的‘气载乎性，犹舟载乎人’的说法，提出了‘性从气发’的观点，从而发扬了这一学派的理气

^{①②} 李贽：《焚书》卷三《卓吾论略》，万历十八年刻本。

多元文化视阈中的李贽军事思想——从湖北麻城到山西大同

无缝隙、性在气中的学说。”^①与薛瑄同时的还有一位布衣学者，江西抚州崇仁人吴与弼，毕生居于乡里，自耕自食，其思想多从夜寝枕上得来，从者亦众，形成了“崇仁之学”。这一派的学者兼采朱熹、陆九渊之学，由明初的理学逐渐转向明中期的“心学”。“河东之学”、“关中之学”与“崇仁之学”等共同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明朝前期的复兴与发展。

明朝中期，在吴与弼的弟子广东新会人陈献章和江西余人胡居仁的推动下，继承了吴与弼的“崇仁之学”，又自创新派，形成了“江门之学”和“余干之学”，他们愈来愈崇尚陆九渊的心学。“江门之学”的传人湛若水上承陈献章“江门之学”，下启王守仁“心学”，其思想取向处于陈献章与王守仁之间，主要是调和理学、心学两派，比较注重实用，又为明朝晚期的实学思潮开了端绪。明朝中期的学术从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走向了对陆学的继承与发展，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姚江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王守仁是一位既有显赫武功又有卓越文功的一代大师，他主张心理合一，心即理，一反朱学“即物穷理”之论；又主张良知是先天就有的而非后天所致，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不同的是只有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守仁处于明朝中期，对这个时代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多有深入思考，认为世之不治在于学之不明。他所创立的“姚江之学”比较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提出的学术主张均有较强的实践性。

明朝中晚期，王学占据了学术的主流地位。王学发展迅猛，后学众多，支派繁盛，主要的有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和闽粤王学。其中又以江右王学为最，浙中王学次之，南中王学又次之。其余各派不能与三者相提并论。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所记载的浙中王学学者有 19 人，江右

^① 商传：《明代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7 年版，第 279 页。